



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

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科联 编



鼓浪屿

公共租界

何丙仲 著 Gulangyu Lishi Wenhua Xilie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

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科联 编



鼓浪屿

公共租界

何丙仲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鼓浪屿公共租界/何丙仲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1
(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
ISBN 978-7-5615-3362-8

I. 鼓… II. 何… III. 区(城市)-租界-地方史-厦门市
IV. D892.12 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84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361021)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168 千字

定价:180.00 元(全套 10 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社科丛书编委会

顾 问：洪碧玲

主 任：朱崇实

副 主 任：林书春 张亚梅

常务副主任：陈家传

委 员：苏文金 邱太厦 黄 强 陈二加 洪英士 潘力方
陈怀群 王 琰 陈宝安 蔡 旗 李 桢

“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编辑部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划排序)：

何丙仲 何其颖 陈明光 陈嘉明 林兴宅
郑小瑛 洪卜仁 黄 猷 龚 洁 彭一万

主编、总审稿：黄 猷

编辑部主任：张亚梅

编辑部副主任：陈怀群 王 琰

执行副主任：王 琰 陈仲义

编 辑：李 桢 文治平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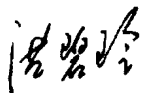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厦门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积淀的现代化港口风景旅游城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形成了瑰丽多姿的文化和丰富独特的文化遗产。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音乐之乡”，“钢琴之岛”之美誉，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近现代中西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造就了一种既具有深厚的闽南文化传统，又具有浓厚西洋文化特色的文化形态和风格，是厦门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浓缩和代表。

为进一步研究、保护、传承鼓浪屿历史文化，厦门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聘请生于鼓浪屿、长于鼓浪屿的福建省社科院原副院长、资深文史专家黄猷先生为总审稿人，联合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策划、精心研究、精心编撰出版《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以史话、风光、建筑、音乐、宗教、

原住民、公共租界、侨客、教育、学者等十个专题为主要内容，较客观准确地介绍了鼓浪屿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充分展现了鼓浪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是一套系统研究鼓浪屿历史文化的史料读本和百科全书。相信《厦门社科丛书——鼓浪屿历史文化系列》的出版发行，对于传承、弘扬鼓浪屿历史文化和厦门特色文化，提升厦门市民的人文素质和城市文化软实力以及鼓浪屿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0年1月

序 言

何丙仲先生近日推出新书《鼓浪屿公共租界》，作为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社科联、厦门市社科院主编的《鼓浪屿文化丛书》之一种，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鼓浪屿是闻名远近的风景区，近代曾沦为多个国家共同统治的“公共租界”，中西文化在这里产生过撞击，发生过交流，现存的近代建筑文化和大量人文方面的遗存，诸如音乐、绘画等，已成为一项很重要的文化遗产。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将鼓浪屿纳入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申报的过程也推动了学术界对鼓浪屿文化历史的研究，何先生的新著便是一个例证。

何丙仲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服务于厦门市博物馆和郑成功纪念馆。于明清史和闽南文化研究，作出不少有益的贡献。我曾引用过他的《厦门碑志汇编》中的资料，对他吃苦耐劳地辑辑乡邦文化史料的精神，深感佩服。他家世居鼓浪屿已历五代，又长于田野调查。我虽曾在鼓岛居住过多年，阅后

仍颇有所得，甚感欣喜。对这本小书的印象简述如下：

一是来自西方的史料丰富。他利用曾经旅居美国及在荷兰莱顿大学访学的机会，搜集有关厦门地方史的资料，并自行翻译，由是本书的资料来源多一途径，视野自然较开阔；

二是图文并茂，给人颇多新意。如作者论述“工部局”译名的来源，让读者从中看到了清廷在近代外交中的思维方式：

“工部局的英文为 Municipal Council，原义是‘市政会’的意思。这个名称始于上海，据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洋人圈地为保护区，且砌筑了围墙。事后这些洋人还向清政府索讨砌墙的费用，清廷遂派员以工部的名义处理此事。以后在这基础上划出租界，就把双方共管的机构称作‘工部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上海公共租界划定之初，Municipal Council 所做的事多以建房修路、疏浚水沟、改善环境为主，而在清代，此类事情乃属于朝廷六部之一的‘工部’的职责，于是 Municipal Council 就被上海人称为工部局。鼓浪屿沿用上海公共租界那一套，连工部局这个名称也照搬过来。”

三是通过大量史实进行考证，对一系列鼓浪屿地方史问题得出有学术价值的结论，如：

（一）鼓浪屿近代文化是闽南文化的一朵奇葩。近代以来居住鼓岛的闽南人，大部分在海外“淬过火”，在经济能力和文化视野等方面，已具备主动吸收或移植多种文化营养的能力，这

个过程并非简单的“中西文化交流”便可说明的；

(二)鼓浪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公共租界之前的近四十年间，该岛已逐渐成了“外国人居留地”，公共地界章程无非是一个使之“合法化”的过程。

(三)英、美等国家在岛上建领事馆的时间；

(四)公共地界章程正式生效的时间。

等等。

何丙仲先生的新著，功力深厚，令晚辈感佩。鼓浪屿近代历史是极其丰富的宝库，还有待学术界同仁从各方面共同努力，深度发掘。

汪毅夫

2009年10月

CONTENTS

总 序 / 洪碧玲

序 言 / 汪毅夫

第一章

“番仔”爬上山” / 1

第二章

贩毒与掠卖华工的地方 / 7

第三章

列强势力重返鼓浪屿 / 15

第四章

擅自据为居留地 / 22

第五章

“恫吓瓜分剧狡狴” / 32

第六章

软硬兼施的荒唐骗局 / 37

第七章

套在鼓浪屿人脖子上的枷锁 / 45

第八章

Municipal Council 56——工部局 / 56

第九章

会审公堂与厦门交涉署 / 74

第十章

“鼓浪洞天”的文化传统 / 81

第十一章

西洋风 / 87

第十二章

台胞、华侨是鼓浪屿多元文化的催生剂 / 99

第十三章

鼓浪屿公共租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 / 107

第十四章

多样化的社会生活 / 118

第十五章

鼓浪屿人民的抗争与公共租界的终结 / 129

[附 录]

近代来厦外国人名中英文索引 /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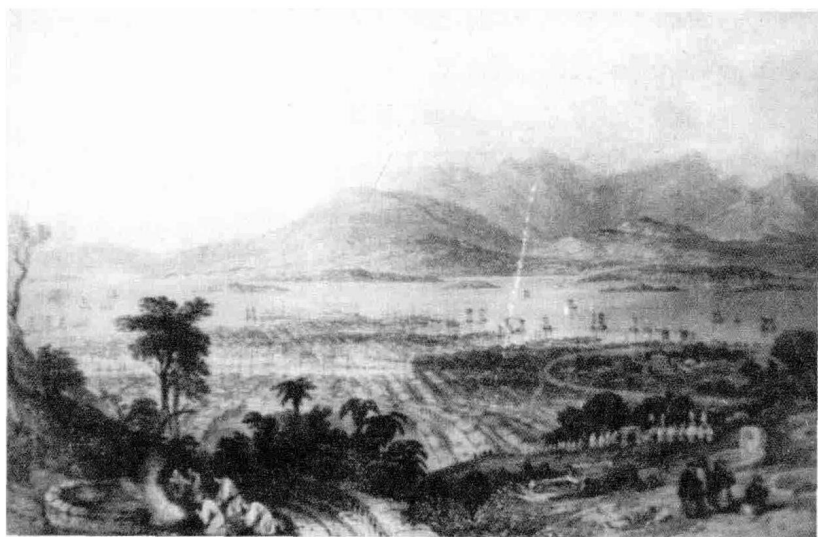
后记 / 169

第一章

“‘番仔’爬上山”

1841年8月26日，下午一点。已经在大担洋外面逡巡一天的英国舰队突然成群结队破门而入，扑向前方以鼓浪屿为正面的“漳州河”口（厦门湾），顿时炮声震天动地，硝烟弥漫。与此同时，英舰也向厦门港东南的长列炮台和对岸的屿仔尾炮台发动猛烈的进攻。厦门港陷入一片血火之中。鸦片战争的厦门之战，开始把鼓浪屿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推向近代历史的舞台。

早在大航海时代，厦门包括鼓浪屿都已经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18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



清代鼓浪屿的田园风貌



英军进攻厦鼓

不断向外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1840年3月，英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同年6月，英国军舰封锁了广州的所有航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接着，英军部署舰队，在中国东南海岸发动战事。1841年8月，英军近代化舰队在英国女皇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的率领下进犯厦门，投入的兵力共有官兵2500名，战舰10艘，载炮310门，武装船4艘，运输船22艘。^{〔1〕}

在他们的眼中，鼓浪屿是“漳州河”口最重要的一处战略要地。他们看到厦门周围有许多小岛，但“最有兴趣的一个是鼓浪屿，它与

厦门城只有一水之隔，这条水道直通厦门内港。事实上，占领鼓浪屿，厦门本身或者更恰当地说它的城市与市郊就都处在我们完全控制之下了”，他们还了解到，清军已“在鼓浪屿这个小岛上设置牢固的堡垒。……（鼓浪屿）是厦门的钥匙。当时中国人已经在堡垒上架设了不下七十六门的大炮”^[2]。经过4个小时激烈的炮战，清军不幸战败，英国侵略者登陆厦门。在这场惨烈的炮战中，仅“在一小时二十分钟之内，鼓浪屿的三座主要炮台便被打哑了，为数约一百七十名的水兵由爱利斯上尉指挥在该岛登陆，并占领了后面的高地。第26团的三个连也被指派担任这个任务……协助进行肃清炮台的工作”^[3]。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巴麦尊外相于1841年6月2日的《致海军部各长官函》就明确训令：“可以占领厦门附近的一个岛屿，它将使英国军队可以控制该城与大陆之间或该城与海上之间的所有联系”^[4]，英国政府看中的那个岛屿，就是鼓浪屿。英军攻占厦门以后，在城内烧杀抢掠，直到9月5日，才秉承英政府的指令，把三艘军舰和三艘运输船以及500名士兵留在鼓浪屿^[5]，然后离开厦门继续北上。

从1841年9月5日到1845年的3月22日（农历二月十五日）^[5]，因所谓清廷付清了赔款，英军才全部撤出鼓浪屿。鼓浪屿遭到英军的武力占据前后共5年。英军盘踞鼓浪屿期间，控制着整个厦门港，并以“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兼管驻中华领事署篆璞鼎查”的名义，向香港等地海关发布告示，声称“闽省厦门港口被我船据守，凡有各国船只前往该港之鼓浪屿海面带货买卖者，应蒙我官助佑”^[6]。

1842年2月24日，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大卫·雅裨理（David Abeel）和美国圣公会的牧师文惠廉（Wm.J.Boone）夫妇^[7]从香港乘坐英舰来到鼓浪屿，开始传播“福音”。同年6月，美国医疗传教士甘明（W.N.Cumming）也赶到鼓浪屿，他们在海边租用

民房办了一间医务所，还经常渡海到厦门，甚至到内地活动。^[8]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第二年7月22日和10月8日，双方又先后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此后，外国侵略者就利用这些特权，在通商口岸开始伺机开辟租界，逐步在中国扩张势力。

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开埠。舰长纪里布（Henry Gribble）为首任英国驻厦门领事，几个月以后，由阿礼国接任，乔治·苏里文（George G. Sullivan）任副领事，第98团的瓦德上尉（Lieutenant Wade，即后来的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爵士 Sir. Thomas Wade）任翻译员，温彻斯特（Charles Alexander Winchester）为领事馆医生。首批来厦的英国领事官员和前期到达的传教士们在英军的羽翼下，都窝在鼓浪屿的兵营里。

外国史料多处记载，最初来到鼓浪屿的英国人看到的是这个小岛“地多岩石，起伏不平，大部分是不毛之地，但也有不干净的稻田穿插其间，使此地环境极不卫生”；“有一个时期，我们在这里驻扎的部队的死亡率是很可怕的，几乎没有一个军官不生过病”。^[9]事后他们总结鼓浪屿“对40年代早期来到这里的传教士和商人们失去了魅力”的原因时，归咎于该岛的卫生状况殊劣，“鼓浪屿要比厦门还不利健康”。^[10]

当时，岛上只有内厝澳、鹿耳礁和“岩仔脚”（即日光岩麓）三个民居聚落。此外皆为山石、坡地，田园相当有限。1962年诗人李禧先生根据“七十余年前郭氏嫂口授”，记录了一首鸦片战争时期的厦门民谣：“炮仔红吱吱，打城倒离离。番仔（按：闽南话，即外国人之意）反，鼓浪屿做公馆。番仔爬上山，城内任伊搬。”说明当时鼓浪屿和其他东南沿海口岸一样，都遭受到“番仔”的

肆意烧杀和抢掠。

然而，第一次踏上鼓岛的英国人却发现“岛上有几座整洁的甚至是雅致的郊区别墅，室内摆设着雕刻精美的木家具”^[1]，最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按：指鼓岛居民）对欧洲人的风俗习惯比广州商人更加熟悉。他们能够列举东印度群岛的物产和讲述许多地方的政府，如数家珍。新加坡的名字对所有的人都很熟悉”。^[12]看来，当时鼓浪屿人不但有农夫和渔民，还有下过南洋，甚至“对欧洲人的风俗习惯比广州商人更加熟悉”的人。

[1] 关于当时英舰的名称和载炮的数量，可参阅《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3] [9] [英]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168、17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5] 关于英军最后撤出鼓浪屿的时间，各种记载均为1845年，但无具体时间。今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道光二十五年（按：1845年）闽浙总督刘韵珂等的《敬陈历次筹办福州厦门两处夷人住处情形及鼓浪屿夷兵业已全数撤退缘由折》考证其具体日期。其奏折称：“鼓浪屿夷兵上年十二月间已撤去一队。彼时亚利国以请将空出民房交还。……至本年二月十五日，夷兵皆全行撤退，惟夷官、夷商五人因厦门夷馆甫经兴工建造，仍住屿内所占民房，仅止数座。”（明清档案部藏，全宗4，150号卷，第7号）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为1845年3月22日。

[6] 政协厦门市文史委：《厦门的租界》，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

[7] 因为根据美国归正教会单方面的记载，一向都认为第一个到厦门鼓浪屿传教的只有雅裨理一人。但包罗的《厦门》记载，“文为廉牧

师夫妇和随同他们前来的雅裨理医生于1842年抵达厦门”。毕腓力的《厦门纵横》也说“著名的文惠廉牧师……在厦门只有几年（1842—1844），后来转到上海。他的妻子的遗体安息在鼓浪屿洋人公墓（1842年9月26日）”。可见首批乘坐英舰到鼓浪屿的传教士及家属共三人，并非雅裨理一个人。

[8] Gerald F. 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2*,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U.S.A. 1992。

[10] [美] 毕腓力：《厦门纵横》，何丙仲编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 [英]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 [英] 麦克法森：《在华二年记》，见《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